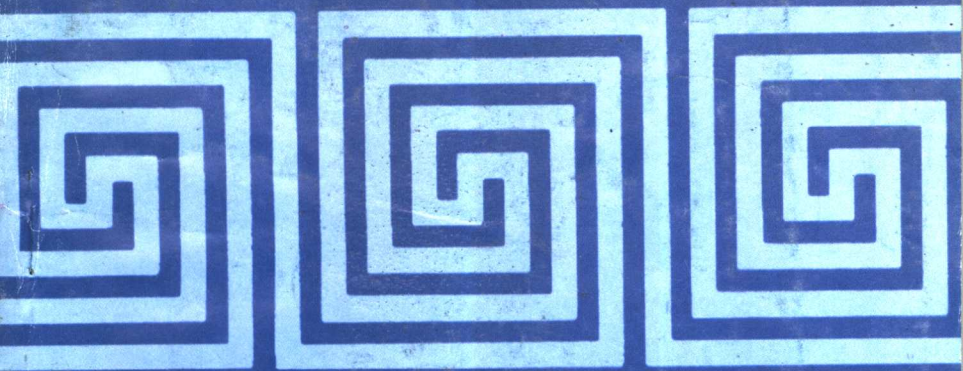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史丛书

中国文化“原典”

—《周易》

王振复



03

-80

沈阳出版社

中国文化“原典”

——《周易》

王振复

沈阳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

中国文化史知识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岱年

执行主编

朱立元

委 员

王振复 李祥年 周振鹤 葛剑雄

朱立元 涌 豪

总策划

石铜钧

责任编辑

封兆才 祝乃杰 葛君 田雪峰

封面设计

曾一中 庆芳

目 录

一、“易”本占筮	(1)
二、书名意蕴	(14)
三、成书之谜	(24)
四、易图择要	(59)
五、文化超越	(72)

一、“易”本占筮

在漫长而宏伟的中国文化的历史画廊里，历史古籍浩如烟海，其数量之巨可称世界之最，它们所具有的巨大文化价值与文化智慧的深邃程度，简直无与伦比。

其中尤其《周易》一书，是中华先秦时代留存下来的一部十分重要的文化学巨著，在中华文化思想智慧史上的影响不可估量。自西汉起，《周易》被尊为重要的儒家经典，称为“六经之首”（或曰“五经之首”）。这“六经”依次为《易经》、《书经》、《诗经》、《礼经》、《乐经》与《春秋经》，据说其中《乐经》亡佚，后称为“五经”。《周易》居其第一，可见其地位非同一般。到了宋代，随着儒家文化的发展，“五经”又最后扩充为“十三经”，它们是《周易》、《尚书》、《诗》、《礼记》、《春秋》、《周礼》、《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与《孟子》。于是《周易》雄居于“群经之首”。同时，在魏晋时代，《周易》与《老子》、《庄子》又被合称为“三玄”。玄者，幽微玄妙之谓。可见在中国古代，《周易》一书不仅地位“显赫”，而且理玄义深，以

艰古难懂而闻名于世。

《周易》一书的文化本涵，以及它的文化模式异时态的流迁演化，是一种几乎纵贯自先秦以来中华文化思想史的巨大而复杂的民族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确实富于独特的文化学认识与研究价值，蕴涵着原始巫学、数学、天文地理学、文字符号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美学与文艺学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因素，是一个集中华古代命理、数理、天理、圣理、哲理、心理与文理等于一炉、属于颇为原始意义上的文化集成。这用古人的话来说，叫做“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一》）虽说这是推崇《周易》的古代易学家夸饰有过，因为世上决没有哪部书的文化内涵可以囊括、穷尽这个无穷的大千世界，做到“无所不包”。然而，其文化意蕴的庞繁、深邃与独特，尤其是它那独具的文辞符系统所造成的独异的文化品格，确是值得注意。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周易》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综合知识”库，是所谓“东方神秘主义”的代表之作，也是诸多中华古代文化智慧的综合体。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周易》是一个“空套子”，似乎什么都可以填进去，消化得了，解释得通。这不是我们的幻觉，也不是思想走入迷途，而是说明《周易》的思想容量确实较大。这也许就是这部文化典籍的特殊魅力之处吧？

自古至今，对《周易》的研读即易学几乎持续不断，历代未废，它基本上一直是一门显学。据近人高亨先生说，《周易》的注家不下千余，据说在这方面留下的著论约三千余种，

比较重要的也有一、二百种。有人作过统计，将“五经”其余各经的注解文论加起来，也不及《周易》一经的著论多。

虽说“五四”以后半个多世纪里易学领域稍显沉寂，仍有一些所谓“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往往读易心醉。现在呢，又在新的文化“热”中新易学“热”如火如荼，在神州大地各种易学研究团体相继成立，出版了许多历代易学名著以及今人撰写的易学新著，其数量之大，是空前的，易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也有所革新，其成果不可低估。

不仅在中华本土，《周易》居然也深得洋人青睐，在欧美、日本与东南亚等地也不乏知音。

早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有一位西方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与当时来华传教的耶稣教传教士鲍威特友善。鲍威特入乡随俗，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外人居然也“崇洋迷外”，成了《周易》的一个爱好者。他于1698年，将两张易图带回欧洲，并赠予同样热爱中华学术的莱布尼茨。这两张易图，一张是《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简译：Segregation-table），另一张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Square and Circular Arrangement），据说，原由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晚年派其朋友蔡季通经荆州到四川从民间购得，源于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一书。大家知道，莱布尼茨是二进位制数学的创始者，二进位制数学是现代计算机的数理基础。莱布尼茨首次将传入欧洲的易图进行数学翻译，从中发现，《周易》六十四卦即 $64 = 2^6$ ，与其所创始的二进位制数理不无相通之处。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岗维尔和凯厄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曾经指出：“我们看到他（莱布尼茨）关于代数语

言或数学语言的概念也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正如同《易经》的排列体系预示二进位制一样。”（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的确，人们似从洋人所撰写的众多易著中，听到来自域外以“易”文化精神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魂的历史“回声”。

无论中外古今，《周易》的研究者与崇拜者总是绵绵不绝。《周易》之所以具有如此持久的魅力，在我们想来，恐怕是因为它向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然哲学与人生境界的缘故吧！人们不怕《周易》文辞符号的枯燥艰深、耐得寂寞，执着追求、乐此不倦。

《周易》的自然哲学与人生境界令人探寻不已。

初次研读这部大名鼎鼎的中华先秦“原典”，仿佛来到了地狱的入口处。不是由于眼前一团漆黑而深感恐惧，而是因为面对着一个似乎是完全陌生的世界。

其文辞的简古深奥不免令人感到茫然与窘迫，卦爻符号这种文化“密码”一时难以“破译”，加以卦爻符号与卦爻辞之间的语义关系错综复杂，朦胧游移，显得这位智慧“老人”的脾气刁钻古怪，甚至面目可憎，或是向人露出神秘的微笑。

当代读者与《周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时差，这造成了漫长的心理距离。由于《周易》巫术的文化机制要比一般的巫术复杂、高妙得多，它是如此繁难，以至于似乎要怪自己的悟性不够。

确是一个中国古代文化的“黑洞”，对一系列卦爻符号的“译码”，亦即接受与被接受，是发生在今人与古人之间的一场艰苦的“对话”。

依稀踏进青泥盘盘、幽静古朴的窄巷小弄，抚摸被悠悠岁月无情侵蚀的残垣断壁，那浓得化不开的古老气息，令人骤感现代生活的快速节奏突然拨慢了，整个心灵因而沉寂宁静下来，好像实现了对中国古代文化一种情感上的“皈依”，也不免有一点苦涩的滋味浮现在心头，因为从文化整体来说，《周易》给我们提供的有些文化信息毕竟过于陈旧了。

但穿过泥泞的沼泽小径，拂去历史的尘埃，这里是一个伟大的心灵的“宇宙”。不只有愚昧和稚浅，有黎明前的黑暗，有撕肝裂胆的痛苦与忧患；也有生的喜悦、爱的挣扎，有诗的韵味，有满天云霞，一湖碧波，有长河的奔涌，大地的磅礴，光辉的日出！有天籁、地籁与人籁的交响，有轰轰作响的来自远古的回声……更有《周易》原始巫术文化的童蒙智慧犹如晨星闪烁，撩人心魄，它牵引我们上下求索的文化心灵跋山涉水，寻访探问，渐入佳境。

那么，谈到《周易》的文化基质，有一个问题必须首先提出来，这就是，它究竟是不是一部巫术占筮之书呢？

《周易》一书，已在世上流传了数千年，人们对它的译读、谈论与研究已经够多的了。可是，对它的文化基质到底是不是巫术占筮这一点至今尚无一致的看法。这种文化现象本身就值得令人深思。

有一种目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周易》是讲哲学讲思想的书，卜筮（巫术种类——引者注）只是它的躯壳”。（《学易四种》吕绍纲序）说《周易》是“讲哲学讲思想”的，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看来，《周易》的哲学思想等文化内容，并不是与原始占筮相对立或是无关的，《周易》的文化基质在于巫术占筮，在巫术占筮中包蕴着哲学与其它文化思想的胚

胎和因子。巫术占筮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巨大文化现象，尽管不无迷信，但不能将其看成没有任何哲学与思想因素的东西。《周易》巫术占筮是一种精神实体，并且有它一系列的巫术操作系统，它所反映的是一种客观的文化存在。因此，我们不能将巫术占筮仅仅看作《周易》文化智慧的“躯壳”。

并且，在后人对《周易》一书文化智慧的诠释与发挥中，已将《周易》巫术占筮中原本蕴涵的哲学和其它文化思想因素发展为成熟的、高级的种种文化形态，但在比如成熟、“高级”的《周易》哲学中，巫术占筮作为一种原文化，仍像阴影一样伴随其始终。在《周易》大传中，讲得很多的是哲学，但同时也谈巫术占筮，哲学与巫术是纠结在一起的，似乎不能将哲学看作是内涵，而将巫术占筮仅仅看作是它的“躯壳”。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一读《周易》大传就可明白。

魏晋时代，有一位著名的玄学家王弼，他对《周易》的研究，由于痛感汉代《周易》研究重“象数”，立誓“尽扫象数”，从“义理”（哲学）着手。虽然这位天才少年（王弼寿命很短，只活了二十四岁），一反汉易的繁琐，从而创立了易学研究的义理学派，进而构建他的玄学思想体系，但也没有真正做到彻底摒弃《周易》原本所具有的巫术占筮的文化基础。我们今天试读他的《周易注》一书，仍可从其字里行间，发现作者运用卦爻符号阐发其玄学、易理的努力，而《周易》的卦爻符号，原本就是用于进行巫术占筮的。

后代对《周易》文化的理论发展，况且不能彻底“摆脱”巫术占筮这个《周易》的文化基质，就《周易》本文而言，就更不可将巫术占筮误认为仅仅没有任何思想内涵的所谓“躯壳”了。

有的《周易》研究者，将《周易》文化原本巫术占筮的观点斥之为“烟雾迷离之说”，认为“占筮与《周易》本来无缘。但从春秋到现在，研究《周易》的人却几乎无不用占筮讲《周易》。显然，这都远远离开了《周易》本身。因此，我们要弄清《周易》的本来面目，就必须首先摒除占筮说”。（宋祚胤《周易译注与考辨》自序）进而提出三条理由来支持《周易》原本并非巫术占筮之书的见解。

其实，这三条理由都不能成立。

首先，这位《周易》研究者说，因为《周易》六十四卦中的革卦有“未占有孚”四字，就据此断言《周易》作者不相信什么巫术占筮。其实恰恰相反，“未占有孚”的意思，是说“还未开始巫术占筮，就已经相信将要得出的占筮结果了”，正好说明《周易》作者对巫术占筮的虔诚。《周易》原本是一部巫术占筮的汇编，它的卦辞、爻辞本质上都是关于巫术占筮的记录，倘若说《周易》作者真的不相信什么巫术，我们今天也就根本看不到《周易》这部重要的先秦古籍了。

其二，在由孔子门徒所编纂的《论语》中，也有“不占而已矣”的说法。但凭这点怎么能够证明《周易》并非巫术占筮之书的见解？《周易》大传确与孔子有点关系，这是我们在本书后文将要谈到的。不过《周易》本文即《周易》古经肯定与孔子的思想无关。《论语》中记载孔子“不占而已矣”（意思是“不用占筮，算了。”）的话，这与《周易》到底有什么相干？

其三，《荀子·大略》确曾说过，“善为《易》者不占。”但荀子生在战国后期，与《周易》大讲巫术占筮的本文部分的成书年代相距近千年。后代学者的这种思想，自然不能用

来证明《周易》原本并非巫术占筮之书的观点。

还有的《周易》研究者，比如侨居比利时的沈宜甲先生，他在所著《科学无玄的周易》一书中说，“周易一书，为周代之中国文化结晶品，包罗万象，亦若百科全书，含有哲理、数理、医理、物理、生理……及命理。”这说得很对。但说到《周易》的“命理”，称“即占卜，阴阳八卦，在古为迷信，在今为游戏。与牙牌数相若，愚者信之，达者玩之，而二千多年来伪儒易学之徒，只嗜其糟粕弃其精华，如朱熹之流竟云易为占卜之书，太为渺视且侮辱易经。”

沈氏自幼熟读四书五经，但是不喜欢其中的《周易》一书，因为他认为所谓阴阳八卦之类，都是无稽之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许是战争所带来的几乎是全球性的浩劫与苦难，物质生活的匮乏与人心的苦闷，促使西方人的思想、情绪与精神努力向东方古代的文化学术寻求回归与慰藉，人们这就自然地看中了《周易》，使其重新“风行全世”。据这位《周易》研究者自己说，“为好奇心”，在一九七〇年七十岁高龄时“重温旧课”，“以近代科学、哲学方法治易，排除八卦迷信，乃发现其精深伟大之哲学、科学价值与近代吻合。”

这种力排《周易》文化的糟粕因素，努力运用新视角，新方法研究《周易》的尝试，对于传统易学仅仅迷恋某种象数妄说、以巫术迷信为“科学真知”的不良倾向而言，无疑是一大进步，因而值得肯定。但我们不以为《周易》的巫术占筮，阴阳八卦之类，其文化智慧一概是彻头彻尾的“糟粕”。即使假设其都是必须抛弃的“糟粕”与文化垃圾，也不足于证明《周易》原本并非巫术占筮之书。《周易》的巫术占筮、阴阳八卦之类与其科学、哲学内蕴之间不是井水不犯河水、毫

不相干的。如果因为害怕自己会被沦为似乎为人所不齿的“朱熹之流”，所以不敢承认《周易》原本是一部巫术占筮之书，这在情感与逻辑上看来总有点说不过去。而且，按照《周易》的本来文化面貌，实事求是地承认《周易》原本用以巫术占筮，其文化智慧的原点在于巫术占筮，这也不是“太为渺视且侮辱易经”。

目前在易学研究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这便是某些易学研究者可能出于对中国古代文化成就的某种优越感与陶醉感，有意无意地盲目抬高《周易》的文化品位，将其“现代化”。

比如说《周易》的六十四卦“揭示”了成为现代计算机数理基础的二进制啦、又说十七、八世纪西方莱布尼茨是因为受到当时传入欧洲的易图的启悟从而发现与创立数学二进制啦等等，其实，是莱布尼茨发现数学二进制在前，莱布尼茨看到传到西欧的易图在后。这位著名数学家见到易图时，只是惊喜地发现易图所蕴涵的数理在某一方面与二进制数学相一致。虽说莱氏曾经说过，“易图是留传于宇宙科学中之最古纪念物”，《周易》六十四卦中包涵着 $64=2^6$ 的数理因素，但《周易》的作者并未得出 2^6 这个乘方算式，更没有推导到 2^n 这个数理逻辑阶段。而且，易图是后人的创造，在《周易》本文中还没有易图。

因此实在应该说，尽管《周易》早已具有丰富、深邃的数学逻辑与数理因子，这是了不起的杰出创造，我们应当为中华古代的辉煌学术而骄傲。但现代计算机数学基础二进位的发明权其实并不属于《周易》。

正是由于诸如此类对《周易》文化价值颇为不切实际的

文化心态，才连《周易》原本巫术占筮之书这一点也不肯承认，仿佛一旦承认这一点，便是炎黄子孙脸上无光，有辱祖宗，便是贬低《周易》。实际上，按照《周易》文化的本来面目介绍与研究《周易》，丝毫无损于这部中国古代重要文化典籍的学术地位和巨大文化价值。

中华古代文化史上，对《周易》一书文化基质问题的争论一向很多，但一般都认为《周易》原本用以巫术占筮。

历代经学家都异口同声地尊称《周易》全文为“经书”，直到如今还有称《周易》为“易经”的。“经”这个汉字，本是丝织的名称。书籍称“经”，可能因为古代以丝织物编成绳子、用以编连竹简成为书册而得名。在《史记·孔子世家》里，就有关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记载，这是说孔子勤奋读《易》，反复阅览，导致编连竹简的绳子断了多次。这里“韦编”一词，就具有“经”的本义。后来随着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将“经”的概念凝固化、谶纬化、神学化，将“经”本义加以引伸，称为“经典”，意思是不易的“真理”。刘勰就在《文心雕龙》的宗经篇里说过，“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同样尊称《周易》全文为“经”，还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所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缘起是这样的：据说，秦始皇听李斯之言，焚书坑儒。这使所谓由孔子所编纂的“经”残缺散佚。秦代儒生为了躲避焚书之劫，有人将一些典籍偷偷地藏在墙壁夹缝之中。到了汉代，朝廷设立“五经”博士制度，博士们所采用的经书本子，是用当时所流行的汉隶体书写的。隶书在汉代，好比我们今天所通用的楷书，所以称为“今文”，用这种“今文”书体所书写的经书本子，称为

“今文经本”。后来，据说那些始皇时代为免遭秦火、偷藏于壁间的古书陆续被发现，这些古书是用汉以前所流行的大篆或古籀体所书写，故称为“古文”与“古文经本”。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仅由于其所用经本子的书体不同而得名，而且两者对《周易》一书在“五经”中所处的学术地位以及文化属性的看法也不同，由此形成中华文化史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派双峰对峙的局面。今文经学派尊孔子为哲学家、教育家，因而他们所说的“五经”的排列次序是以《诗经》为首，随后依次为《书经》、《礼经》、《易经》和《春秋经》。古文经学派认为孔子是历史学家，进而认为“六经皆史”。由于他们相信《周易》是传说中的伏羲氏所作，历史最为久远，资格最老，因此将《周易》列为“五经之首”。

然而，不管今文经学派还是古文经学派怎样歧义纷呈，他们在《周易》本为巫术占筮之书这一点上倒是意见多为一致的。

《周易》一书，可以说从其成书之时起，就是用以进行巫术占筮的。最早出现《周易》这一书名的古籍是《左传》。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672 年）记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左传》昭公七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这足证明，早在大约二千五、六百年之前的春秋时代或者更早时期，已有《周易》一书流传于世并且用于进行巫术占筮。

正因为《周易》原本巫术占筮之书，所以才没有被秦始皇的一把大火烧毁。想当年李斯奏请秦始皇实行焚书政策，那奏本上就写得明白，“所不去者，医学、卜筮、种树之书。”就是说，以上三种书不在焚毁之列。《周易》原本用以巫术占筮，

才能得免秦火。始皇好神仙，求长生，据说多次派人入海采“不死”之药，因为认为《周易》为巫术占筮之书，对其必定抱着一种诚惶诚恐的崇拜心理，当然不敢也不愿加以焚毁了。

后来这件事在《汉书》里面，追记了一笔，“及秦燔（烧）书，而《易》为卜筮之事，传者不绝。”汉代刘向的儿子刘歆也指出，“汉初，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书。《易》以卜筮故，遭秦火而全，故今古文经本无大差异也。”这是说，由于《周易》原本巫术占筮之书，未遭秦火，所以无论“今文”还是“古文”本子，在内容上倒是没有什么差异的。

在这一点上，后代易学家多持此说。比如近人李镜池研究多年、学养颇深。他以为有些《周易》研究者，由于不明《周易》巫术占筮这种文化的底蕴，所以才生出种种牵强附会的说法；由于喜谈哲理，刻意求深，于是又有许多玄谈妙论。其实这些都与《周易》的文化基质无关，不是《周易》的本来面目。他在《周易探源》一书中说，《周易》本为数术，为巫术，而非哲学。《周易》是巫术占筮之书，我们应从这一文化角度去加以研究。

另一位当代易学家高亨也说，“易经既是筮书，筮人自然要根据卦爻的象数来判断人事的吉凶。”（《周易大传今注》自序）在他看来，《周易》巫术占筮之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然，高亨反对以迷信巫术占筮的态度去识读、研究与宣传《周易》的所谓“神秘”，指出对占筮迷信不必加以“追求”，这是很重要的意见。诚然，关于《周易》占筮，确实存在着一些未知领域，但我们对待这种所谓“神秘文化”的态度，则始终应当是冷静的，理性的。《周易》文化肯定具有一定的原朴的科学因子，但并不等于说这种巫术占筮本身就是什么

“科学”。古人云，“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汉书·河间献王传》颜师古注）。对《周易》文化的研究应当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参考文献

1. 王弼《周易注》。《王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 朱熹《周易》。《朱熹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3. 程颐《周易》。《程颐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4. 王阳明《周易》。《王阳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5. 王夫之《周易》。《王夫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6. 戴震《周易》。《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7. 惠棟《周易》。《惠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8. 阮元《周易》。《阮元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9. 孙堂《周易》。《孙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0. 孙星衍《周易》。《孙星衍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1. 孙堂《周易》。《孙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2. 孙星衍《周易》。《孙星衍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3. 孙堂《周易》。《孙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4. 孙星衍《周易》。《孙星衍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5. 孙堂《周易》。《孙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6. 孙星衍《周易》。《孙星衍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7. 孙堂《周易》。《孙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8. 孙星衍《周易》。《孙星衍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9. 孙堂《周易》。《孙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0. 孙星衍《周易》。《孙星衍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